

# 群众办报: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闻实践

熊忠辉

(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新闻传播系,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运用文献资料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闻实践——群众办报。分析认为,工农群众需要和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共同推动的群众办报新闻实践,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形成血肉联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活动中的具体实践,为群众学习和理解中国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群众路线;群众办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66-09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指出,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作了全面发挥和概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sup>[1]</sup>,即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随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创造性地发扬群众路线思想,最终顺利地建立了新中国。

在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具体表现为群众办报实践,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旗帜下,群众办报实践日益成熟。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群众路线<sup>①</sup>的践行方式,群众办报作为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实践,其时也初具雏形,但由于党的革命斗争理论体系尚未成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群众共同斗争的这段历史中,群众办报并未结构性地发挥出密切

联系群众的重要作用。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中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得趋于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部署和领导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这三大主体,开展了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学习和实践。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闻宣传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和体系在延安时期渐趋完善,中央要求办报者都应该具有鲜明的党性,服从党的领导、形成高度自觉的政治敏锐性,让办报为人民

<sup>①</sup> 李里峰在《“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系统考察了“群众”“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等概念的历史演进。他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把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随着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和群众理论的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和治理技术。他还提出例证,认为:“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详细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其中写道‘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就笔者所见,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参见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页。

收稿日期:2015-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XW003)

作者简介:熊忠辉(1972-),男,江西临川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这是“政治家办报”<sup>①</sup>思想日趋成熟的系统体现。以这个思想理论为统帅,新闻宣传事业开始探索发展“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实践方法,形成了党领导下兴办党报和各类报纸的先进做法;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形成了群众参与阅读报刊、自办黑板报和为报纸写稿的群众性新闻实践机制;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团结到“办报”运动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和实践基础。

群众办报拓展了党的新闻宣传实践技术<sup>[24]</sup>,不仅是全党办报的补充性体系<sup>[56]</sup>,更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促进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sup>[7-8]</sup>的相辅相成。群众办报实践丰富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内涵和外延,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它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工程,是党领导和组织群众充分运用学习、教育、宣传等方式、方法普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生动实践,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已臻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产物,群众办报理论最终有机地纳入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 一、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实践主体

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的初期,毛泽东就从战略方向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9]</sup>随后几年,毛泽东更是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以敏锐的政治远见、深刻的洞察力,深入思索抗日和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各种实践推进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体系性建设。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需要依靠群众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但在建党、建军之始,党内和军内同志的文化知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比较贫乏,要使他们系统理解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和开展革命工

作,就必须对他们加以教育和训练。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9]</sup>所以,他主张:“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sup>[9]</sup>

进入延安地区(时期)后,党的外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一方面是日军的大举封锁和“扫荡”<sup>②</sup>;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一次次的反共高潮。而党内环境也仍然很复杂。遵义会议促使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全党在思想上还尚未系统、彻底地清算这种错误,不少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此外,抗战初期发展了70余万新党员<sup>[10]</sup>,这些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缺少必要的革命斗争锻炼,且受到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出现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密切结合实际、广泛联系和发动群众参与革命,这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协调一致建设和夺取革命胜利产生了消极影响。

为此,1941年4月,中国共产党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延安整风”,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全党反响强烈。整风的目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方法去灵活地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彻底清算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促使全党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全党范围以及党和群众之间促进团结和统一,从而争取抗战的胜利。

这是对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进一步深化,明确指出了这种中国化的成果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能洋腔洋调,

①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1957年和1959年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毛泽东与当时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时提出的。他要求办报人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素质,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原则。虽然正式的概念是在建国之后提出的,但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时直至1959年,都鲜明地体现了讲政治、讲党性这个核心。从历时性的立场看,“政治家办报”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内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核心。参见陈力丹《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载《新闻战线》2010年第10期。

② 日军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封锁和空中轰炸,没有规模性的地面部队进行“扫荡”,但轰炸却是常有的事情,这种轰炸可以看作是“空中扫荡”,而诸多根据地遭受日军的地面扫荡成为常态。综合考虑,文章此处把“地区”修改为“时期”可能更能涵盖党当时在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的外部环境的整体情况。

不能脱离群众,要大众化。大众化要求党员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sup>[11]</sup>。群众不赏识、不理解革命道理,中国共产党就无法领导这股强大的基础性的革命力量去战斗、去夺取胜利,“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实践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就在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搬硬套国外的革命理论,脱离了以农村社会为主的实际,失去坚实的工农群众基础,革命就成为无本之木。

熟知新闻宣传之于革命理论传播重要性的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自然要把宣传媒体这种核心资源纳入党的直接领导下,运用报纸等媒介资源,在革命主体中广泛而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革命理论。1942年3月8日,针对《解放日报》存在的新闻性、群众性不强的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8个字实际上是号召全党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来开展各项工作,引导全党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形成求真务实、苦干实干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党内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作为其中最卓越的代表,已经完全清醒和科学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对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渐趋成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法手段,使之充分发挥武装全党、武装群众、掌握群众的作用。

## (二) 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三大实践主体之一

普遍深入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也是党的全面建设的首要环节。1941年,针对党的理论建设依然十分薄弱的情形,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提出要祛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上的幼稚病,就必须好好学习,要通过各种形式来组织学习。这标志着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党内正式进入重大阶段。

实际上,在进入延安后不久的1938年5月,中央就成立了马列学院,并专门设立了编译部,负责

马列著作的翻译。在抗日战争8年间,中国各地区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sup>[12]</sup>。这些著作的大量出版,为广大革命者了解、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对促进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对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工作部署<sup>[13]</sup>。1941年9月26日,中央学习组(也叫中央研究组)成立,毛泽东为组长,参加人员范围是中央委员层次的,目的是“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同时,“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sup>[14]</sup>。在这场持续的学习活动中,全党干部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sup>[13]</sup>,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探索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中国共产党在狠抓自身学习以克服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深入思考和着手发动广大群众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好坏也同等甚至更重要。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是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基础力量,是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主体,但他们的局限性总体上比党员干部还严重,也迫切需要进行学习改造。由于他们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组织性有所欠缺,这种学习改造需要党的部署、领导和引导才能完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应时、应势地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口号,并在局部执政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大力推行具体实践。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方面旨在推动“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通过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借以实现政治立场和话语体系的改造,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意识、组织性、坚定性提高到工农大众的水平”<sup>[4]</sup>;另一方面,也希望工农群众通过知识分子的帮助实现“工农分子知识化”,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两者共同改造、共同提高,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以说,这种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具体实际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中进行的创新。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盛况,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更加集中体现出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文艺要反映工农兵生活,要反映当前的实际,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比较迅速地被文艺工作者接受并随之贯彻到实践当中,此后文艺的大众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和潮流<sup>[15-16]</sup>。

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谓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延安“文艺整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党对知识分子主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实践吹响的“号角”,目的是促进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质是改造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sup>①</sup>。这与党内的整风运动保持了一致。与文艺创作紧密关联起来的群众办报活动,则是对群众的学习进行改造,是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这两个涵盖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重要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必然步骤和重要环节。

在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到革命战争的文化活动中,他们创新先进文化形式,“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和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sup>[17]</sup>,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和“群众办报”,调动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各类文化宣传活动,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创作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编歌剧《白毛女》、新民歌《东方红》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群众》等一批大众化报刊,大量宣传农村、农民的新鲜事情。

这些“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为群众喜闻乐见,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共同完成的,是知识分子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之中,汲取基层养分创作出来的。群众通过学习和教育实践,与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形成了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人民群众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都渗透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sup>[11]</sup>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些文艺形式和传播方式,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功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传播<sup>[18]</sup>。

## 二、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组成部分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本身就是普及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践行工作。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既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对象,又是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主要依靠力量,这就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和创新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针对广大工农群众,更加需要运用合适的宣传方法。工农群众不仅是武装革命的依托力量,也是文化宣传的有力支撑,发展群众办报这一实践样态,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工农群众通过参与新闻宣传活动,了解党的意图、响应党的号召,并借此推动生产、军事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延安时期的群众性新闻宣传工作,走过了“为群众办报”到“让群众办报”两个阶段,或者说,这是两个递进的认识和实践,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从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展到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 (一) 宣传思想工作是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条件让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投身于各种文化活动,文艺、报纸、教育、卫生工作者都动员起来<sup>[19]</sup>。而新闻宣传作为文化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形式,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掌握全国性的宣传资源体系,在创办和利用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党的理论、扩大社会影响、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党中央尽可能地发挥了智慧。1939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从中央局起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

①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分工负责文艺界的整风。当时,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作家的观点与立场等问题上,文化人存在比较普遍的认识偏差,集中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等,都发生严重争论。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召开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总结时指出:“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毛泽东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等问题,还针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8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朱德点明了文艺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sup>[13]</sup>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应经常接受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一切代价设立之。”<sup>[14]</sup>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所办的大量报刊,对于宣传抗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争取大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sup>[20]</sup>,在宣传思想领域首先体现在报纸改革这项重要工作上。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组织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sup>[14]</sup>这次党报系统的改革,更加强化了报纸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的宣传功能,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

## (二)全党办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宣传领域的伟大创造

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就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党报改革纳入重大工作的范畴。在1942年2月1日召开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对《解放日报》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在改版后的第一张报纸上发表社论《致读者》,在这篇由博古执笔、毛泽东等人修改后定稿的社论中说:“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到其应尽的责任。”<sup>[21]</sup>社论指出报纸“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sup>①</sup>,鲜明地提出了党报应该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曾任改版后《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后来回忆说:“《解放日报》的改版,是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风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sup>[22]</sup>

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一切依照党

的意见办事。这是对马克思关于报纸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重要斗争武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使得《解放日报》和各地的党报及其新闻工作者更加直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更自觉主动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对整风改版以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sup>[23]</sup>“全党办报”确立和强调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并创新了新闻业务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结晶。此后,在全党办报理论的指导之下,党的新闻宣传事业进一步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和深入实际方面探索发展,形成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 (三)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共同构成党的新闻宣传体系和制度

在党报改革的指引下,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依据群众路线原则,在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群众办报”机制。这个机制有两层意思:一是党报等一切报纸要反映群众的生活,并使之常态化,就是“为群众办报”;二是报纸要发动群众为报纸写稿反映身边的人和事,并使之制度化,就是“让群众办报”。这个范畴的办报,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发挥主导作用,带领群众探索办报新方式。此外,在报纸媒介之外,党还发动和领导群众充分利用身边的黑板、墙壁等物质载体,兴办黑板报和墙报,探索和实现了群众自己动手办自己的“报”<sup>②</sup>。

在清醒认识到党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

① 《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此前,1942年2月11日已经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② 马克思主义者所谈及的群众办报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报刊活动,但它与全党办报不是主从关系,更非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的“群众办报”思想的着力点在于,在观念上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不能把党内办报和群众办报割裂开来。当然,从理论形成的过程看,首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理论由发展到成熟,接着才有明确的群众办报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但自建党和建军之初起,党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就是由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起进行实践的。某种程度上,群众办报在苏维埃时期就已经有所实践,但由于其时党的斗争理论及其党报理论还不成熟,党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在延安时期之前并没有形成结晶。历经苏维埃时期和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党报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包括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发展出来的群众办报理论,是“让群众办报”与“为群众办报”的有机统一,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参考朱清河《“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朱清河《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sup>[21]</sup>的基础上,报刊这种强流动性的载体开始了实践探索。第一层次的实践,就是把以党报为核心的报刊建设成为反映人民大众面貌的新时代新天地。比如对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及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解放日报》都做了充分的报道,起到了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第二层次的实践就是发动群众为报纸写稿,发展通讯员被摆到突出的地位。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整风学习的需要,1942年8月25日的《解放日报》发出号召:“边区的一般文化程度是这样低,能用文字表达意见的人是这样的少……请尽量使用自己的笔来替群众讲出他们所要讲的话吧,尽量替我们那些积有丰富经验而不能够执笔为文的工农干部做喉舌吧!”<sup>[24]</sup>但是,知识分子“替”工农群众“讲话”显然还不够,工农群众还要努力学习自己“讲话”。10月4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要求“提高工农干部写文章的热情和信心,打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写文章的错误心理,要告诉知识分子同志们,应跟工农干部学习,拜他们为先生;同时又应该帮助工农干部修改文章,作他们修理文章的理发员”<sup>[25]</sup>。这里说的修改文章,指的就是帮带通讯员写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根据地的报刊媒体大量涌现,在严重缺乏专业新闻从业者的情况下,各类报刊把工农通讯员事业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讯员队伍迅速壮大。至此,工农通讯员事业由建党早期分散、秘密的小规模状态,发展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群众性文化景观<sup>[2]</sup>。再加上田间村头随处可见的墙报、黑板报,党的新闻宣传体系和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道理以这些通俗化的方式在群众中普及并获得认同和支持,群众办报成为无产阶级党报体系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征。

### 三、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新闻领域的生动实践

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党员干部需要通过宣传思想工作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整顿自己的作风;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主要负责生产宣传产品或进行文化教育,在生产过程中注重“政治与技术”素质的融合性提高。这两大实践主体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比较好培养,而要让广大的工农群众认

识到自己的革命性作用并能自觉主动融入到革命活动中,就不仅需要给予他们政治身份、经济基础的合法性,也要从文化地位上确立其正当性,并通过可行的方式方法实现出来。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运用学习、教育、新闻宣传等手段和方法,把群众教育好、团结好。增强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是广泛开展群众办报的基础性、先行性的条件,群众办报又促进了工农群众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的提高。在学习和办报这个互动互为的系统性工程中,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以积极发挥。

#### (一) 通过群众性的教育和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延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活动,把复杂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和逻辑体系通俗化、具体化,把一开始都以为是高深莫测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让一般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都能够普遍了解、认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成功地运用到实际中,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这种创新促进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当时,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水平很低下,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措施,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实际工作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以此来不断提升其政治素质,提高民众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于民众的教育,首先是以识字为中心,帮助他们摆脱文盲境地。1940年,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的批示》中要求“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sup>[26]</sup>。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组织编著的《边区民众读本》分《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3个部分,后来还陆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编写了《新汉课本》《日用杂字》,识字课本《农村应用文》《庄稼杂字》等<sup>[27]</sup>。这种教育虽然不一定把马列主义的原著和文章直接作为课本、教材,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思路、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在上述教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指导思想,使工农群众知道应该自立、自主,明白阶级斗争的道理,明白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认识到互助组、农会、减租会等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组织形式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不仅是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抗战政策”,而且“高度重视宣传方式的时代性、灵活性和多样性”<sup>[27]</sup>。党领

导知识分子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创办了《边区群众报》等多种地方通俗报纸,用以提高群众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普遍的方式和手段。

## (二) 把宣传教育工作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鉴于群众的知识水平非常有限,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不能像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那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作领域,而是要把理论渗透和结合到群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才可能被群众接收和认同。在中央的深入号召和精心部署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员和从事党政军群等各种具体工作的人员,开始注重到农村、学校、机关参观考察,参加实际调查研究乃至直接从事某些宣传教育活动,将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体现出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不久,延安地区迎来了根本性、全面性的大众化。很多宣传和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精神的鼓舞下,下乡采风、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接触到根据地的实际,增强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深入农村、民众中体验生活后,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为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找到了发生转变的坚实依据。新闻从业者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是党实现宣传功效所依赖的重要力量,他们更加主动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办了服务群众的《边区群众报》等报纸,把笔头放在群众身上和心上,大量运用地方语言和民间表达形式进行写作,在群众中获得了良好口碑。

但是,工农群众要实现为自己说话的目标,就特别需要增强写作的能力。党为此选择新闻写作作为工农群众文化翻身的一个突破口。1943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党报的记者应该“立定志向做一个工农兵的记者”<sup>[28]</sup>。对于当时很多人所持的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低下的偏见,陆定一给予十分明确的回应:“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不错,他们是没有技术的,但技术是可以提高的,这需要长期的不倦的教育。我们既然办报,我们不尽这个责任,倒叫谁来尽这个责任呢?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还需要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出来。”<sup>[29]</sup>这

些新的办法,包括下乡帮带群众办文化补习班、办黑板报墙报、发展基层通讯员。

## (三) 结合实际和具体情况让群众办报生动和丰富起来

推进工农分子知识化,必须进行大众化的工作,要照顾到全民的特点,既要考虑到对于一般落后地区现实状况的认同,也要着眼于对其未来发展的不断提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群众办报理解为办报纸、写稿子。延安时期群众办报的内涵是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也就是“办”)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养,其外延也就十分丰富,一切文化形式和物理介质都可以成为宣传资源、传播渠道和发布平台(也就是“报”)。在这种实事求是、发明创造的创新驱动下,各类文化宣传活动十分生动和丰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第一,充分利用民间社火、戏剧等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表现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1935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就要求宣传工作要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戏剧歌咏等活动<sup>[13]</sup>。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民众剧团,其后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八一剧团、抗战剧团、鲁艺评剧团和延安评剧研究院等专业化剧团也相继成立。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探索,在传统戏剧的基础上融入了歌剧等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内容,创造了《白毛女》《兄妹开荒》等许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戏曲作品。

第二,就传统意义的群众办报机制而言,新闻既要“到群众中去”,也要“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除了要求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去发掘新闻宣传信息源头外,还包括群众亲身参与“办报”实践,通过办报实现知识化。到1944年,群众办报的实践活动大致发展为3个方面:群众读报、群众办黑板报、工农通讯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办报实践,形成了“知一信一行”的模式。

在田间地头,在补习班、互助会,在随时随地的环境中,工宣队、下乡的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以及具有初步识字能力的群众,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非正式的读报评报竞赛。群众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生动、鲜活、通俗的新闻、故事,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蕴含其中的革命道理,并随即体现和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办黑板报和墙报是当时最为直接和普遍的群众



办报活动<sup>①</sup>。在知识分子的帮带下,逐渐掌握了识字和写作技术的群众,充分利用身边的黑板、墙壁等载体,采取漫画、短文等简单便捷、老百姓又易于接触和理解的形式办报。刊登的内容既有关于时事的及时报道,还有社论、革命理论、群众生活、诗歌,不仅注意到知识的普及,更关注政治思想的宣传、群众生活的改善、不良社会风俗的改良<sup>[30]</sup>。这种形式的效果非常好,被墙报、黑板报批评和表扬的任何事都给当事人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种方便易行的“办报”形式,对增强民众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素质,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产生了很强的实际效果。

在兴办报纸层面,群众办报思想打破了仅仅依靠少数专业新闻人员办报刊的传统做法,要求办报人走群众路线。曾负责《解放日报》改版的陆定一提出,要办好党报,“必须赞成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创中国报界的新纪元”<sup>[24]</sup>。

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展开通讯员工作》社论指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能干编辑和优秀的记者,而且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sup>[24]</sup>。因此,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成为新闻媒体的通讯员,就成为革命过程中一种显见的文化现象。

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党对群众办报的不断强化,通讯员队伍更是迅速壮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地新闻宣传机构培养了大批基层通讯员,在践行群众办报方针的过程中,较好地充实了新闻宣传队伍。如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新华社已经拥有近3万名通讯员,1948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通讯员就有4.6万多人,通讯员每月平均投稿约3万篇<sup>[31]</sup>。这些来自基层和群众的鲜活稿件,极大地宣传了革命新气象、社会新风尚,鼓舞了人、引导了人。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讲到:“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sup>[32]</sup>从1942年《解放日报》“深

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到这次“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的讲话,这个不断深化的思想和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为群众办报”向“让群众办报”的转变。这一思想的实践基础,来自于192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的新闻宣传实践,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中的新闻实践。

如今看来,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基础主要由广大工农群众和相对少数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化必然要求大众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相辅相成。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是要以各种形式组织三大实践主体系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表现为各种学习活动;二是以多种形式促进三大实践主体科学运用基本理论用以指导实际生活和工作,主要表现为围绕着生产、战斗两大任务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得以发展和完成。在践行生产和战斗这两大任务的进程中,宣传是关键性的连接元素,办报是宣传的一大集中表现。毛泽东和党中央高瞻远瞩地进行战略动员和部署,有效运用各种性质的媒体和文化资源,构建了一支融合式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sup>[33]</sup>,结合中国实际,在三大实践主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本身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共同属于“宣传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架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彼此相依,任何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之举都是有害的”<sup>[34]</sup>。没有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宣传就会失去现实土壤的滋养,反过来看,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必须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通过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得以实践和检验。办报把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不再是简单地履行新闻宣传功能,而是有机地融入和融合这两大领域。

就群众办报而言,它以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素质为直接目的,以发动知识分子紧密结合工农

① 上下文主要论述的是办报实践的“群众读报、群众办黑板报、工农通讯员”3个方面的内容,根据史料,群众办黑板报和墙报是工农群众掌握一定知识后,在文宣人员的指导下,在村头田间的常态性宣传行为,而其中一部分工农群众经由党报包括党领导的报纸的采编人员挂钩帮带,进一步掌握了基本的写作技术,被发展为工农通讯员。本文此处“最为直接和普遍”的说法应该比较准确。下文对通讯员工作有专门论述。



群众为主要方式,把培养报纸等媒体的通讯员作为一项制度,把有效利用黑板报和墙报等生活性媒介资源作为常规手段,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为群众办报”到“让群众办报”的历史性转变。群众办报促进党和人民形成了血肉联系,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最生动的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注入了活的灵魂,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所进行的伟大创造。

## 四、结语

如今,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时代,回望那段光辉葱茏的岁月,审视当前已然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尽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对象、范围、方式和结构特征不同于以往,但党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留给我们的经验和理论却是颠扑不破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时代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必须讲人民性,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透过厚重历史,我们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同志“8·19”讲话以及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相关重要论述的科学性、重要性和指导性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田中初.鼓励群众成为新闻传播者——革命根据地时期党促进通讯员事业发展的相关实践[J].新闻记者,2011(7):34-38.
- [3] 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38-44.
- [4] 田中初.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通讯员为视点[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11-20.
- [5] 朱清河.“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21-27.
- [6] 李莉,杜成会.办报是党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毛泽东新闻思想学习札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1):20-23.
- [7] 黄旦.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J].新闻大学,2004(3):14-19.
- [8] 朱清河.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5(2):42-47,58.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徐德莉.传承与裂变:马克思理论学习的拐点——以延安学习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91-96.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陈有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4):61-66.
- [1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5] 赵学勇.延安文艺的大众化:历史实践与当代启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5-28(A5).
- [16] 忽培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N].光明日报,2012-07-02(5).
- [1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8] 程美东.主体意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实践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导向——关于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审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7):24-32.
- [19] 为群.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的好典型[N].解放日报,1945-04-24(4).
- [20] 肖一平.延安整风运动及其深远意义——《延安精神专题讲座》之十二[J].中华魂,2007(6):27-30.
- [21] 佚名.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04-01(1).
- [22] 佚名.在新闻研究所举办的座谈会上陆定一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J].新闻战线,1981(4):2-3.
- [23] 佚名.本报创刊一千期[N].解放日报,1944-02-16(1).
- [24] 佚名.展开通讯员工作[N].解放日报,1942-08-25(1).
- [25] 康生.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康生同志给“笔谈会”编辑同志的信[N].解放日报,1942-10-04(1).
- [26]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27] 程美东.主体意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实践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导向——关于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审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7):24-32.
- [28] 佚名.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N].解放日报,1943-06-10(1).
- [29]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解放日报,1943-09-01(4).
- [30] 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J].新闻知识,2008(3):64-66.
- [31]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3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3] 杨忠民. 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思想的历史

发展与实践[M]. 新湘评论,2010(9):6-8.

[34] 朱清河.“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21-27.

## Masses-run newspaper: news practice of Marxism popular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XIONG Zhong-hui

(Department of Militar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21000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opularization needs to be creatively developed and widely promo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The news practice of Marxism popularity Masses-run newspaper, was analyzed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needs to combine with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intellectuals, and they launch the news practice of mass production of new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Marxism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flesh and blood ti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masses which is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mass line of the party in the operational activiti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and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ory for the masses.

**Key words:** mass line; masses-run newspaper;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he period of Yan'an

(上接第 51 页)

## Possibility of tacit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and its explicit problem

RUI Xi-jie<sup>1</sup>, CHENG Bo<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Center of Xi'an Geological Surve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emphasizes on core link of the conversion from tacit knowledge to explicit knowledge, but the premise of that is how possible the tacit knowledge is. Taken the Plato's theory of learning which is learning means recalling as the proper point-cut of the research, tacit knowledge is considered as consisting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The essence of conversion from tacit knowledge in analysis form to explicit knowledge lies in exploring the knowledge that is contained in the related explicit knowledge but not be conscious of by cognitive subject, while the essence of conversion from synthesis tacit knowledge to explicit knowledge is that the cognitive subject tries hard to look for the knowledge relate to theme and deduces the rules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tacit knowledge is obtained. It can thus be seen that tacit knowledge involving i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not only is possible, but also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xplicit knowledge.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tacit knowledge; epistemology; explicit knowledge